

中国史记研究会丛书

丛书主编

张大可

安平秋

俞樟华



史記研究集成



第十卷

王明信 俞樟华 著

司马迁思想研究

华文出版社

中国思想史研究

史記研究集成

卷十

思想研究

司馬遷思想研究

·第十卷·

司马迁思想研究

王明信 俞樟华 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司马迁思想研究/王明信, 俞樟华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1

(史记研究集成: 10/张大可 安平秋 俞樟华 主编)

ISBN 7 - 5075 - 1565 - 6

I. 司… II. ①王…②俞… III. 司马迁 (约前 145 或前 135 ~)
—思想—研究 IV.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1909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bs@263.net

电话 (010) 83086663 (010) 8308685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州区京华印刷制版厂印刷

880 × 1230 1/32 开本 246.75 印张 4958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 990.00 元 (全套精装 1—14 册)

内 容 提 要

本书《史记研究集成》第十卷《司马迁思想研究》。内容是关于司马迁思想研究古今论文论著的综述与熔铸。第一步，资料搜集论文论著数百篇（部），初步分类排列，确立了55个专题；第二步，筛选论文，删除没有新意、言之无物的论文，选择那些有特点、有新意的论文及论著，进行阅读摘要；第三步，考证复核，再做精选；第四步合成综述，熔铸评析，撰成本书，勾勒学术界古往今来研究者对司马迁思想及其价值的看法，是一次全面性的总结，以资参考。

作 者 简 介

本书主创作者两位，王明信、俞樟华。王明信，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俞樟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史记》论著有《史记新探》、《史记艺术论》、合著《史记研究史略》等。本书参编作者有：范红军、辛战军、张文，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孙洪涛，河北大学历史系教师；张焕宗、沈久泉，南开大学历史系教师；李泉，聊城师范学院教务长、教授。专论选载作者两位：张大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韦苇，西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韦苇著有《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

目 录

第一章 司马迁其人	(1)
一、司马迁交游	(1)
二、受李陵之祸	(5)
三、报任安书	(10)
四、司马迁受宫刑	(13)
五、宫刑对司马迁的影响	(18)
六、司马迁之死	(21)
七、司马迁后裔	(25)
第二章 “史记”其书	(28)
一、“史记”的写作宗旨	(28)
二、“史记”体例散论	(53)
三、“史记”八书	(73)
四、“史记”倒书	(77)
五、“史记”非谤书	(80)
六、史记的人民性	(81)
七、《陈涉世家》讨论	(96)
八、《屈原列传》讨论	(104)
九、游侠问题讨论	(111)

十、史记的历史地位	(120)
第三章 马班异同研究	(127)
一、前人的马班优劣论	(127)
二、“汉书”是继踵《史记》的巨著	(135)
三、关于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	(142)
四、马班思想比较	(147)
五、马班史学比较	(154)
六、马班文学比较	(158)
第四章 司马迁的思想	(165)
一、司马迁的一家言	(165)
二、司马迁的人文观	(173)
三、司马迁的价值观	(185)
四、司马迁的社会观	(192)
五、司马迁的伦理观	(198)
六、司马迁的哲学思想	(208)
七、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218)
八、司马迁的战争观	(229)
九、司马迁的法律思想	(231)
十、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238)
十一、司马迁的民族思想	(287)
十二、司马迁思想的特征	(291)
第五章 司马迁继往开来思想渊源	(304)
一、司马迁思想渊源	(304)
二、司马迁与孔子	(307)
三、司马迁与“儒家”	(317)
四、司马迁与道家	(327)

五、司马迁与阴阳家	(330)
六、司马迁与法家	(335)
七、司马迁与先秦诸子	(341)
八、司马迁与先秦士风	(350)
九、司马迁与屈原	(353)
十、《史记》与经学	(358)
十一、《史记》与《周易》	(364)
十二、《史记》与《尚书》	(374)
十三、《史记》与《春秋》	(378)
十四、《史记》与《左传》	(388)
十五、《史记》与《战国策》	(395)
十六、《史记》与《吕氏春秋》	(399)
十七、《史记》与《楚汉春秋》	(400)
十八、《史记》与神话	(402)
十九、《史记》与档案	(403)
二十、《史记》对后世的影响	(405)

·专论选载·

司马迁的政治观	(439)
一、以史为镜，详述当代史事	(439)
二、反对分裂割据，颂扬汉家一统	(448)
三、赞颂汉初无为，批评武帝多欲	(451)
司马迁的战争观	(457)
一、《史记》是一部古代最完备的战争史	(457)
二、司马迁在史论中表述的战争观点	(467)
三、司马迁战争观形成的历史条件	(475)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	(480)
一、辩证统一的义利观	(481)
二、宏观治国思想	(486)
三、工商业微观经营思想	(492)
四、区域经济思想	(496)
五、财政与货币思想	(505)

第一章 司马迁其人

一、司马迁交游

【司马迁交游考】作者李长之，载《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三联书店1984年重版。文章认为，司马迁是笃于友道的人。他所交的朋友，长一辈的，有唐都、孔安国、董仲舒、苏建、樊佗广、冯遂等。他们或则为司马迁的父执（唐都），或则为司马迁的师辈（孔安国、董仲舒），或则为司马迁友辈的尊亲（苏建），或则为贵族的后裔（樊佗广、冯遂），他们给司马迁的帮助是大多在学业和史料方面。比司马迁晚一些的友人则有壶遂、杨敞、杨恽。他们一个是学生，一个是女婿，一个是外甥，都是晚辈。杨敞和司马迁的关涉不见记载，但一定是来往颇密的，否则《史记》的副本不会在他家。其他二人，则大多传受司马迁的史学，而杨恽在文学上受司马迁影响尤深。司马迁的平辈朋友，有贾嘉、东方朔、挚峻、兒宽、田仁、任安等，之外就是李陵。任安和田仁都是和司马迁气味最相投的；兒宽、挚峻、东方朔则和司马迁的作风有些两样，贾嘉未必和司马迁有太深的交情，李陵则只是因为司马迁为他仗义直言，所以后来人把他和司马迁的关系看得密切了，实则司马迁明明说过“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不深交的朋友，已够司马迁做了牺牲了。

【司马迁交游略述】 作者吴汝煜，载《史记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文章认为，根据有关史料记载，与司马迁有交往的人大约三四十个。一、有自述或历史记载作为根据的，分别有贾嘉、田仁、任安、壶遂、李广、李陵、苏建、孔安国、董仲舒、东方朔、挚峻、公孙卿、兒宽、博士赐、尊大、射姓、邓平、司马可、宜君、唐都、落下閤、淳于陵渠、杨敞、杨恽、周生等 25 人；二、虽有自述作为根据而尚有疑问的，有公孙季功、董生、樊他广、平原君朱建子、冯遂、郭解等 6 人；三、按情理推测的，有霍光、枚皋、王朔、陈步乐、奕大、终军、公孙贺、石庆、延广、王卿、韩说、公孙敖、胜之、刘屈氂等，均活动于武帝中后期，与司马迁同时，揆之于理，当与司马迁相识，因无确证，无法肯定。

【司马迁师承孔安国说考辨】 作者陈桐生，载“学术研究”1997 年第 5 期。文章认为，学者们在司马迁研究中由《汉书·儒林传》而作出司马迁师承孔安国、司马迁习《鲁诗》是受孔安国影响，《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载“年十岁则诵古文”就是从孔安国读古文《尚书》这三个论断是不准确的。首先，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之事不见载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不知《汉书·儒林传》说“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也不够准确。在《史记》中既有今文经学，又有古文经学的观点，而今文经学的成分更大一些，采用今文经说的频率亦远远高出古文经学，所以“我们应当推翻司马迁师承孔安国的说法”。既然《史记》中的《尚书》经学尚且不为孔安国所囿，那么《史记》中的《诗》说受孔安国影响就更微乎其微了。“司马迁采用《鲁诗》作为《诗经》的学习蓝本，这是由《鲁诗》在汉代四家诗中最为先出，说诗最精、影响最大决定的。”因此我们可以从《鲁诗》的自身价值来说明司马迁的《诗》学渊源，而不应该以孔安国作为司马迁的《诗》学老师。至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的“年十岁则诵古文”，也不应该狭隘地理解为史迁 10 岁时则从孔安国读古文《尚书》，而最好是从泛指的意义上去理



解，即迁10岁时开始诵读“古文”，这个“古文”的含义与《史记·封禅书》中所说的“古文”大体相同，不必将司马迁诵古文与《汉书·儒林传》所说的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联系起来。因此，作者从《汉书·儒林传》入手，对司马迁师承孔安国等问题一一作了考辨。

【司马迁与董仲舒】 作者杨燕起。载“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4期。文章就司马迁与董仲舒二人思想的承续及区别谈了看法，认为：“以礼说《春秋》实发于司马迁”。公羊大师董仲舒以“天令”、“天意”说《春秋》，“改变了《公羊传》比较接近原始儒学的性质”，而使其成为神学。司马迁则“更多地继承和发扬了《公羊传》注重礼制的思想”，与《公羊传》从原始儒家的角度阐述《春秋》的思想保持了纯朴的一致性，“且是《公羊传》所述礼的内容的概括和升华集中”。董仲舒关于礼的思想是笼罩在“天人性命”与“阴阳五行”的烟雾之中。从继承的角度分析，司马迁受董仲舒的影响，但司马迁“以鲜明的社会政治特色就人事论人事，使《春秋》礼义游离于宗教神学的体系之外”。所以，以礼说《春秋》是司马迁“从社会历史中不断总结而形成的一种独创，故发人所未发”。在“大一统”问题上，司马迁也讲国家与民族的统一，是受公羊学家的影响。“公羊学家统一的理念是与天命、天意分不开的”，司马迁认为“统一的形成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司马迁并不赞同以统一为旗帜而限制各种学术思想的发展”。董仲舒的哲学思想被汉武帝接受，成为“官方哲学”。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就是与“官方哲学”的一种斗争。司马迁首先以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的结局，批评了天道观和因果报应之说。其次，针对董仲舒的天命论和阴阳五行的结合，揭露和批评了堕衍的阴阳五行学说。第三，运用当时天文学、医学的成就，证明天命、神灵之不可信。第四，在对社会历史发展的阐述上，司马迁以其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与董仲舒的天人之学相对立，他认为历史是人类的社会活动，不是神灵创造。司马迁的思想是进步的、积极的，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份光辉遗产。在天人关系上，司马迁虽然受古代星占

术的影响，但那是极其有限的。作者最后指出：司马迁对董仲舒和汉武帝这种政治思想上的结合采取轻蔑的态度，并认为“董仲舒更有资格成为超过公孙弘的现实政治的‘从谏’家”。

【论司马迁的“交游”思想】 作者张文安，载“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通讯”第5期。文章认为，司马迁的“交游”思想是十分丰富和深刻的。通览《史记》，司马迁的“交游”思想可以概括为三方面：“一、选择朋友的标准是奇、才、气节。好奇、爱才、重气节可以说是司马迁择友的三个特点。”在司马迁的交游中与其最意义相投的是田仁和任安，而他们都是有气节、有才能的人。此外，司马迁还喜欢与奇士交往，与他交游的壶遂就是一个“奇士”。“二、认为‘交游’贵在‘知己’；崇尚‘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精神。”司马迁从自身的遭遇中深深感到“知己”的难得和可贵，于是他便把所有的崇敬和憧憬寄托在历史上那些“知己”的人物“交游”之中了。如在鲍叔牙和晏婴身上，就寄托着司马迁“交游”贵在“知己”的理想和追求；在《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中，表现了司马迁崇尚“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精神的思想。“三、昭示人们真正的友情应该超乎利害，经得起权利、生死、贫富、贵贱等的考验，在利益面前，朋友之间应有荐士和谦让的美德和风度；同时还强调‘势’在‘交游’中不可轻视的作用。”从本质上讲，司马迁的“交游”思想是渊源于孔子的重视伦理道德的儒家思想的，有着鲜明的主观色彩和时代局限性，但其精华，“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刻地洞察社会，把握世故人情实质；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交游’思想，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风气。”所以，司马迁的“交游”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重视。

【司马迁得“江山之助”】 宋嗣廉《论史记与“江山之助”》，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5期。该文从心理机制和文化背景两方面探讨了司马迁“躬身山水”的游历活动。认为司马迁深爱

老庄“乘物以游兴”和儒家“比德”思想的影响，二十而南游，在登山临水之际，感受自然界物质对自己情感的启发与影响，从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中吸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得“江山之助”而成《史记》“雄深雅健”之风格，并获得一种“念天地之悠悠”浩茫的历史意识和悲壮的使命感。不过这种风格的形成，更主要的还在于时代的历史条件及司马迁本人的经历与才学。如果把《史记》行文的起伏跌宕，疏密相间，一唱三叹，读起来令人回肠荡气，全部归于“江山之助”，那就过于片面、不合实际了。

二、受李陵之祸

【司马迁与李陵事件】 作者韩城市司马迁学会，载《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集》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文章认为，司马迁是替李陵兵败作辩解，而不是为李陵后来的变节行为作辩护。李陵从被俘到投降，中间至少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多以后，汉武帝杀死李陵全家，李陵才投降了匈奴，时间应是天汉四年。司马迁是在“陵败书闻”时回答武帝的“召问”的，而不是“陵降书闻”时回答的，怎能是“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在回答武帝的“召问”时，司马迁首先肯定了李陵的为人，其次指责了当时朝廷臣子的败坏风气，对李陵此次出击匈奴作了高度评价，最后猜测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这些内容并没有“诬上”，也无心“沮贰师”，更没有为后来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司马迁在‘李陵事件’中所表现的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坚持正义、仗义执言的精神，是他伟大的光辉的一生的部分。”

【也谈司马迁没有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 作者王云，载“贵州文学史丛刊”1987年第3期。文章认为，倪昭敏关于司马迁没有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他说李陵兵败被俘后并没有马上投降匈奴，而是在天汉四年其全家被杀以后才被迫投降的，并以

此为证据证明司马迁不可能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则是不对的。据《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迁“清清楚楚地写明李陵是在兵败之时直接投降的”，他“也并否认自己遭祸与李陵投降匈奴有关”。不过，“在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时，不论是司马迁还是西汉朝廷（包括汉武帝），都并不知道李陵已投降了匈奴。这一点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回顾为李陵辩护的经过时交待得很清楚。”“朝廷知李陵投降匈奴，是在李陵投降匈奴一年多以后”，而司马迁知道此事，“应该还要晚一些时间”。由此可见，“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是在李陵已经投降了匈奴，但他和朝廷都还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所谓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的说法，显然是完全错误的。”之所以造成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的传统看法，是“班固的一句误记造成的”。班固在《汉书·李陵传》中把司马迁在“陵败书闻”时为李陵进行的辩护说成是在“闻陵降”后。“这就完全掩盖了司马迁和朝廷上下起初只知李陵身陷败于匈奴，一年多以后才知李陵投降匈奴这个复杂过程及其背景”，从此以讹传讹，“遂使后人误认为司马迁在为李陵辩护时就已经知道李陵投降匈奴”了。

【司马迁没有为李陵的投降辩护】 作者倪昭敏，载“贵州文史丛刊”1987年第3期。文章认为，司马迁为李陵的投降辩护的传统说法是错误的。首先，“李陵投降的时间在被俘一年多以后，而司马迁为李陵说话的时间是在李陵被俘以后，投降以前。”怎么能说一年多以前的司马迁会为一年多以后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其次，“单纯地认为司马迁是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得罪下狱，这是后来一些人的认识。”司马迁被腐刑的原因，一是“诬上”，二是“沮贰师”，三是“为李陵游说”。显然，“诬上”是下迁腐刑的主要原因；“沮贰师”未构成事实，不过是下迁腐刑的借口；“为李陵游说”是下迁腐刑的导火线。“总之，所谓的‘诬上’，正是司马迁对国家和民族高度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以及对武帝的忠诚；所谓‘欲沮贰师’，正是司马迁对武帝任人唯亲的鞭挞；所谓‘为李陵游说’，正是司马迁对忠于国家

的人才的爱护。司马迁没有为李陵的投降辩护，司马迁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

【司马迁对李陵之降的辩护有失偏颇】 作者李蕾、甄翠娥，载“黑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文章认为，司马迁作《史记》开创了以纪传体著史的先河，历来人们对司马迁及其《史记》十分推崇。然而对司马迁及《史记》中有的地方持异议者也大有人在，本文作者即认为司马迁对李陵的辩护“有失偏颇”。司马迁对李陵的辩护，主要有三点：一是他认为对国家忠诚可以殉之以身；二是他对李陵与匈奴搏战之勇予以肯定；三是他认为李陵不死而降以期待机报答汉朝。而作者认为，李陵在关键时刻投降，不能叫殉国；空有一身武艺，大势已去即俯首投降，于事无益；说投降是为了寻机报汉，则未免滑稽而谬误。在封建社会里，从忠君爱国角度看，李陵理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而司马迁对“贪生怕死、毕竟作了一个投降者”的李陵产生同情之心，实在是不应该。文章还将李陵同其先辈李广作了比较。李广一身豪气，为李陵作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然而李陵却“投降了匈奴，作了匈奴座上客，为匈奴所重用”。二者“一个崇高，一个卑微；一个可敬，一个可鄙”。文章接着指出，苏武保持汉节久历其大苦大难而不降，对汉朝心坚如铁，更是李陵所不能望其项背的。而李陵自己投降匈奴还不算，竟然劝苏武也和他一样称臣于匈奴，结果是连说“义士”之语，喟然离开。李陵投降匈奴是“坚决、彻底”的，这从单于甚至把女儿嫁给李陵可得到充分证明。单于还立李陵为右校王，说明李陵“不断地对匈奴尽忠”。另外汉朝李陵的老朋友派人请李陵归汉，虽有天缘良机，李陵却执意不肯。写到这里，文章认为司马迁的“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的话已经“无攻自破”；李陵在匈奴二十年，直至元平元年病死也未得归也，“很能说明问题”。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辩】 作者梁建邦，载“渭南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文章认为，司马迁与李陵“素非相善”，为开扩

武帝胸怀而言及李陵事件，并没有为李陵投降辩护和开脱罪责。当时司马迁向汉武帝陈言的内容包括五个方面：第一，阐述了对李陵平时表现的看法；第二，对李陵投降进行了批评；第三，陈述了李陵率军力战的情景；第四，推测了李陵被迫投降的目的；第五，扩展汉武帝的胸怀，反驳大臣们的翻脸之辞。事实上，他是因“诬上”而被处刑的，“诬上”和“诬罔”，皆指以不实之辞欺骗和逆谤皇帝，这是汉武帝给司马迁认定的罪行和罪名。如果说，汉武帝以“诬上”、“诬罔”为司马迁定罪，处以死刑，是司马迁蒙受的第一次莫大冤枉的话，那么，说司马迁曾为李陵投降辩护和开脱罪责，并因此而获罪受刑，则是司马迁蒙受的第二次莫大的冤枉。

【再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是非及汉武帝判以重刑的心理原因】

作者李恩江，载“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文章认为，应该从历史文化心态的角度对司马迁和汉武帝作分析。司马迁为什么要为李陵辩护？一是“李陵平时注重自身修养，洁身自好，大有国士之风，甚得司马迁好感”；二是“李陵此次出征匈奴，‘斩首虏万余级’，虽因亡救而败，司马迁仍以为功不可没”。所以，“司马迁认定李陵的投降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司马迁之对武帝问，是心口如一且十分中肯的，充分体现了一位史学家实事求是的品格。但他毕竟不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并不善于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保护自己。从明哲保身的角度说，他的错误有二：一是“不自料其卑贱”，居然天真地给皇帝就此事出谋划策。二是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情势下忽视了表明自己忠于民族、忠于君主的基本立场。汉武帝惩处司马迁的心理原因，一是想“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二是“两国交战，反对投降，是任何一方统治者都要坚持的原则。武帝是个沙文主义者，极居扩张野心，更容不得投降。”司马迁为李陵游说，在武帝心目中，“就是宣传投降，就罪不容诛”。

【司马迁的冤案和汉武帝的私心】 作者李申，载“争鸣”